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

章叔才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ISBN7-218-01060-1



9 787218 010601 >

ISBN 7-218-01060-1/K·241

定价: 16.00元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

章权才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辛朝毅
封面设计:杨白子
责任技编:孔洁贞
黎碧霞

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

章权才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厂址:(肇庆市狮岗)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20,000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218-01060-1/K·241

定价 16.3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绪 论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是继拙著《两汉经学史》之后的续作。可以视作《中国经学史》的第二分册。所涉及的历史范围是从东汉后期至隋唐逾七百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都很具特点。经学也不例外，也很具特点。揭示这个时期经学发展的特点及其流变规律，进而揭示它在经学发展长河中所占有的位置，是这本小册子的基本任务。

(一)

经学是西汉初年，随着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巩固而登上政治舞台的。在当时是作为统治思想而出现的。儒家的典籍被钦定为“经”；有了“经”，也就有了“经学”。最高统治者对经学怀着特殊的感情，武帝如此，西汉和东汉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也莫不如此。

进入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没有发生变化呢？过去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时期是经学的衰落时期，是经学的崇高位置受到挑战，并先后被玄学和佛学置代的时期。

我们不作如是观。我们认为，经学既是两汉的统治思想，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的统治思想。从两汉至隋唐，经学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是有变化的。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动，统治思想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了经学及其教义决不可能是一成不变。但变化不等于衰败。诚然，玄学和佛学，先后成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显学，但它们始终无法取代经和经学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崇高莫替的位置。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各朝各代统治者褒奖经学和崇儒重教的指导思想是一清二楚的。这可从各朝正史和有关记载中得到充分印证。《晋书》记载司马懿“博学洽闻，伏膺儒教”；《儒林传》记载司马炎上台后更加重视经学，建学校，幸辟雍，选人才，把众多宿德耆儒推上显赫的位置。《梁书》载武帝天监四年诏云：“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七年复诏云：“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北史·儒林传》云：“魏道武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隋书·儒林传》云：“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纲以掩之，賁旌帛以礼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新旧《唐书》中的《儒学传》，都详细记载了唐高祖、唐太宗崇儒重教的史实。值得指出的是，各朝各代的有关诏书，许多都把崇儒重教放在“为首”、“为先”的位置，这说明，西汉以来经和经学受到尊崇的情况并没有明显改变。

魏晋时期风靡一时的玄学跟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有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玄学家内部也决不是铁板一

块。但有一点肯定无疑：玄学的出现决不意味着对经学的否定。魏晋时期的主要玄学家如王弼、何晏，他们以孔子为“圣人”，位置摆在老子之上。魏晋流行的“三玄”，其中之一是儒家经典《周易》。主要玄学家既有玄学方面的著作，又有经学方面的著作。玄学的理论构成，其中许多观点的形成，也跟经和经学息息相关。事实表明，从某种角度上说，玄学是经学的理论升华，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对各家学说的综合。把玄学与经学割裂开来以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

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迅速流播开来。佛教的传播对汉唐上层建筑发生过重大影响。汉唐时期的统治者多数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信佛的同时，决没有忘记崇儒。例如，北魏孝文帝是信佛的，在他倡导下，当时的徐州成了名僧聚居之地，僧渊、僧嵩、道登、慧纪、昙度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所传《涅槃》、《成实》、《毗昙》之学，广布于燕齐赵魏等地。但正是这个孝文帝，在崇奉佛教的同时，又大力褒扬经学。《北史·儒林传》称：“孝文稽古，笃好坟籍，刘芳、李彪诸人以经术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于是斯文郁然，比隆周汉。”又如萧梁，梁武帝推崇佛教，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多次舍身入佛。但也是这个梁武帝，在推崇佛教的同时，又极力推崇经学。天监三年，他皈依佛教；天监四年，他却下诏褒扬儒术。天监五年，他征引扶南僧人僧迦婆罗于寿光殿翻译佛经；天监七年，他又诏令皇太子宗亲王侯就学，接受有关经学方面的教育。梁武帝对佛经，颇有撰述，如《制旨大涅槃经讲疏》百一卷，《大品注解》五二卷，《三慧经讲疏》若干卷等。但，他对经学也颇有研究，所著《孝经义》、《尚书大义》、《周易大义》、《礼记大

义》、《中庸讲疏》、《毛诗答问》、《春秋答问》等，也是当时左右经学界的最高学问。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虽然影响甚大，但它终究无法取代儒家思想的正统且受到崇奉的位置。

魏晋南北朝隋唐，有关经学的著作汗牛充栋。据朱彝尊《经义考》统计，主要经学著作，《诗》学不下七十部，《尚书》学不下六十部，《三礼》学不下二百部，《易》学不下二百部，《春秋》学不下一百七十部。还有许多有关《论语》、《孝经》、《尔雅》方面的著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连篇累牍的经学著作中，许多是御用儒家所撰，有些则是历代最高统治者所撰，所谓帝王经学占了相当的篇幅。经学著作数量之多，从另一角度说明，这个时期的经和经学，仍然是受到当时最高统治者所重视、所鼓励、所支持的统治思想。

(二)

纵观七百年来经学的流布与变迁，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这是经学由分而合的历史过程。皮锡瑞《经学历史》把魏晋南北朝说成是“经学分立时代”，而把隋唐说成是“经学统一时代”。他认为这七百年经学历史的发展，存在着由分而合的总趋势。这个观点是可取的。众所周知，两汉经学是当时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既然是统治思想，也就内涵着相对统一的最高要求。统治阶级对经学从来没有放任自流；相反，它总是通过立学、立师和经学讨论会；甚至通过御注和讨论会中的“称制临决”，对经学理论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强而有

力的干预和导向。西汉中期召开的石渠讨论会和《石渠奏议》的成书，以及东汉初期召开的白虎观讨论会和《白虎通》的撰作，都是最高统治者对经学理论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进行直接干预的最好例子。这是问题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经学的统一又是相对的。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斗争、中央集权的强弱明晦、经学家的政治和思想倾向、经和经学的抄本或版本在流传中的是非曲直，诸如此类的因素，都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经学的变态。事实是，两汉经学确实存在着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综合经学的分野；而不同派系内部，又往往派生出诸如师法、家法和一家之言的问题。东汉后期王权的旁落，意味着最高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生产再生产干预力量的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促使原已出现的“家法林立”局面的强化。两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治的分裂，又使经学进一步朝着南辕北辙的方向流去。“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北史·儒林传序》中所说的一句话。这表明，南北朝时期，南北经学在经义阐发和治学风格上确实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到了隋唐，随着政治统一局面的形成，经学的发展也随之出现新转机。隋代，经学是由分立而综合；唐代，经学是由综合而统一。隋代刘焯、刘炫和陆德明的经学，体现了南北经学的综合。唐初《五经正义》的钦定和后来《九经正义》的出现，则体现了经学在综合基础上的进一步统一。这些通过最高统治者钦定颁行的经学，也就成了日后明经取士的主要根据。

第二，这是经学从章句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自西汉儒家独尊局面形成以后，经学成了两汉的官学。但在治学风格上，却一直存在着章句训诂之学和义理之学两种

方法的对立。章句训诂之学的特点是寻章摘句，烦言碎语，结果是窒息了经学的生机。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如此针砭：“古之学者，耕且养，二年而通一艺，存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祸也。”于是物极必反。到魏晋以后，曾经在西汉热闹过一时的经学中的义理之学，又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学中探究天人之际，阐发本体论的哲理迅猛发展，其标志是玄学的出现；隋唐时期，经学中的政治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是《五经正义》中有关“义”的钦定。经学受到重视的程度，取决于经学中的经义满足现实政治需要的程度。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经学中义理之学的发展，也就使经学的社会和政治价值得到提高，使它在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第三，这是三礼之学实现了新发展的历史过程。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学，有两个显学：一个是《易》学；一个是三礼之学。《易》学从天人之际、从哲理方面进行纲维；三礼之学则从情性、从伦理道德方面实现纲维。礼的核心在于“分”，分尊卑，分贵贱，分上下。阐发这种礼义的礼学，从荀子开始已经理论化，而在两汉以后则实践化了。这样的礼义，一向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普遍重视。但历史事实表明，不同时期，礼学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说，两汉时期，礼学的社会功能重在维护君权；那么，魏晋南北朝以后，礼学除巩固君权外，主要是围绕巩固族权而展开。这跟世家豪族势力的迅猛发展息

息相关。这个时期的三礼之学，主要是迎合世家豪族各方面的需要：一方面是迎合他们炫耀门户的需要；一方面是迎合他们在宗族内部实施约束的需要。这个时期，礼学家人才辈出，有关著述十分宏富。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有关“丧礼”的著作尤多，可统计的不下五十部。主要经学家如王肃、杜预、贺循、裴松之、雷次宗、周续之、刘瓛、何佟之、皇侃、沈文阿等等，都曾围绕丧礼大做文章。他们推崇丧礼，目的是炫耀死人，并以死人约束活人。由此可以看出，魏晋以降三礼之学的发展，是世家豪族的理论要求，也是经学趋向保守化的一方面表征。

第四，这是经学为北方更多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接受所传扬的历史过程。可以这样说，经和经学，在其发端的时候，是北方农业民族主要是汉族的意识形态。其中所包含的种种礼仪，最初显然是这个农业民族原始风俗习惯的凝聚。它那逐渐丰富起来的统治方术，多数也是这个民族的统治者在阶级分化后，在维护统治秩序实践中的理论选择。两汉时期，经学的地缘界线，主要也是局限在中原一带。但是，历史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情势不同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经和经学开始进入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史载，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都通晓经学，不同程度但却毫无例外地都重视经学教育。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八有一个条目，叫“僭伪诸君有文学”；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一分册也有一个条目，叫“五胡诸豪有才学”，谈的就是这方面情况。与五胡诸豪相较，北朝统治者崇儒重教的情况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北史·儒林传》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接受经学，是因为中原汉族文化较他们先进。史实表明，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进主中原后，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差异以及

中原一带经学的固有特点，他们接受经学，首先是接受经学中的以郑学为代表的章句训诂之学，而后才是接受经学中的带有玄学色泽的义理之学。他们接受经学的目的，一是在于使自己进入正统；一是在于加速自身的汉化；一是在于争夺知识分子，以便同南朝作更加有效的斗争。客观上则起了强化中国的政治文化统一和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第五，这是经学在同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相互交流中进一步充实自身理论体系的历史过程。近七百年中，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件大事是佛教的东渐和随之而来的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流。外来的佛教所以能在中国本土传扬开来，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利用。佛经的翻译，寺庙的兴建，僧侣种种特权的赋予，西向取经官员的派遣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这时，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已握有两手：一手是传统的经学，一手是外来的佛教。儒家思想既是入世的，也是出世的，但主要还是入世的；佛教教义既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但主要还是出世的。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两者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发挥各自的功能。统治阶级以神道设教的宗旨，又使两者得以并行不悖。但是，既然把两种文化绞在一起，它们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碰撞，因为碰撞，也就会出现吸收、扬弃和孕育新的文化形态的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化发展的史实表明，两种文化碰撞，结果是外来佛教有所变态，而传统儒学也有所改观。在统治阶级的意向和佛教教义作用下，经学家队伍出现分化，有的成了亦儒亦佛，有的成了弃儒入佛，有的则表现为以儒反佛。经学理论也朝着两方面发展：一方面是经学中原有的唯心主义发展了；另一方面是经学中原有的唯物主义也发展了。佛教的变态则表现为在吸收中国固有文化过程中，逐步形成中国

自己的佛教派系及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三)

如何从总体上评判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经学价值呢？这牵涉到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问题。

过去有些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最大特点是“黑暗”，政治上的黑暗必然导致思想文化上的黑暗。因此，他们对这段时期的经学、玄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方面，多取否定的态度。他们用极多篇幅描述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何清谈放逸，如何消极遁世。这些著作在人们面前展现的图景是灰色的、死气沉沉的。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不可否认，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这个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农民战争、民族战争连续不断，社会生活动荡不安。面对着这样的局面，知识分子包括经学家中的一部分人或者感到前途渺茫而消沉下去，或者感到痛苦而寻求精神解脱。世家豪族的享乐主义也因此而抬头。这样的社会现实必然影响到经学理论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于是，经学中的天命论、讖纬论、贵无论、复古论、出世论以及礼学中一整套迎合世家豪族需要的理论，便一时甚嚣尘上。有些经学家和玄学家崇尚清谈，甚至发展到放浪形骸、蔑视礼法、背离经学传统教义的地步。在经学史、思想史研究中，看不到实际存在的黑暗和腐朽的方面，显然是不对的。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变

乱的社会现实也容易引起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考。变乱远远没有使所有经学家和知识分子消沉下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不满足现实发展到企图改变现实。他们从经学理论中寻求出路。于是，促进了当时经学中从经义到治学方法的变革。这种变革思潮，肇始于东汉之季，到魏晋南北朝形成高潮。东汉桓灵时期郑玄、何休等人的经学，内涵着变革时政的要求；三国时期刘表支持的荆州学派表现出反传统经学的倾向；魏晋之际的正始玄学，跟正始改革有着内在联系；王弼的“排击汉儒，自标新学”；范宁的《谷梁集解》对当时漫延的玄谈多有诟病；范缜的经学有着浓烈的反宗教迷信的色彩。这些，都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地体现了当时的变革思潮。他们提出的变革论、一统论、崇有论、有为论、反佛论和一整套反腐败的理论，在变乱的魏晋南北朝，都不失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理论，是这一时期经学中的闪光点。

隋唐经学的综合统一，是政治统一趋势的必然结果。它回过头来又对政治统一起了很大的反作用。唐代的明经取士，一准于《五经正义》，它是汉代所倡导的“经明行修”政策的继承，是经学在更大范围内的贯彻。《五经正义》陶冶造就了一批统治人才。但经义一旦钦定，便转化为教条，结果是束缚了人们的理论思维，也孕育着人才培养的宗派化。到唐中叶后，随着庶族地主的迅速成长和武则天上台，唐初钦定的《五经正义》已难以适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又出现了变革传统经学的呼声。王元感、啖助、赵匡、陆淳、刘知几等等，就是经学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是不仅打破了当时经学研究中的沉闷局面，吹入了一股新鲜气息，而且开了日后宋学的先河，直接影响宋代以后的经学表现形态。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东汉后期世家豪族的黑暗统治与经学集团中清议之风的兴起	(1)
一、东汉后期绝对君权的疲弱与世家豪族的黑暗统治	(1)
二、以中兴政治为着眼点的经学集团中清议之风的兴起	(9)
三、党锢之祸和经学集团新的思想动向	(23)
四、名教之治的动摇与儒家人才理论的新发展	(32)
第二章 魏晋时期世家豪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及经学中的“王郑之争”	(51)
一、魏晋时期世家豪族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及其理论要求	(51)
二、经学家王肃的社会地位和学术渊源	(56)
三、王肃经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58)
四、王肃对郑学阵地的攻夺和“王郑之争”的实质	(62)
五、关于王肃的作伪问题	(70)

六、关于王肃经学的历史地位	(76)
第三章 经学中繁琐的训诂之学向义理之学的演变与何晏王弼的经学	(80)
一、妨碍经学功能发挥的训诂之学把经学引入困境	(80)
二、经学中义理之学的复兴和玄学的出现	(85)
三、以《论语集解》为代表的何晏的经学思想	(94)
四、言意之辨及王弼对经学的标新立异	(104)
五、何晏王弼的历史评价问题	(126)
第四章 西晋儒家大族统治地位的确立及经学群体中尚名教与任自然两种思想倾向的斗争	(131)
一、西晋儒家大族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名教之治的重新提倡	(131)
二、经学群体中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及其演变	(135)
三、经学家杜预、刘寔对名教之治的正面褒扬	(151)
四、批判玄谈崇儒贵有的政治家傅玄和裴頠的理论主张	(156)
第五章 世家豪族的腐朽没落与东晋南朝经学保守倾向的强化	(163)
一、东晋南朝世家豪族势力的发展与没落	(163)
二、玄谈之风对江左经学的影响	(167)
三、范宁的《谷梁集解》及其反玄谈的思想倾向	

.....	(170)
四、“三礼”之学——东晋南朝世家豪族的显学	
.....	(175)
第六章 经学在北朝少数民族汉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	(179)
一、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普遍重视经	
学和经学教育.....	(179)
二、以继承汉代章句训诂之学为主要特点的北	
朝经学的传授.....	(183)
三、经学在北方少数民族汉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	(186)
第七章 佛教的东渐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经学理	
论的相互渗透	(194)
一、佛教的东渐与中外文化第一次大交流.....	(194)
二、以神道设教——北朝佛学与经学的共生点	
.....	(199)
三、南朝的佛学和经学在义理方面的相互沟通	
.....	(209)
四、南北朝时期以儒反佛思潮及经学中传统理	
论的继承和发展.....	(222)
第八章 隋代的政治统一与南北经学的综合趋势	(234)
一、隋初调和政策的实施和对经学的提倡.....	(234)
二、隋代南北经学综合的历史趋势.....	(239)
三、经学家刘焯、刘炫对南北经学的综合.....	(242)
四、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其反映的学术风尚	
.....	(245)